

编者按：自从美国贸易代表提出对中国进行“301调查”以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就蒙上了一层阴影。“301调查”的本质是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是对现有国际贸易体系的破坏，给积极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各方力量“泼了冷水”。

历史上，美国曾对多国发起过“301调查”，迫使日本、巴西、韩国等国作出让步。然而，历史上那些遭受“301调查”的国家不同于如今的中国，前者的谈判实力和经济体量相对于美国来说太弱，而中国拥有更强的谈判实力。中方将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美国与昔日盟友的“301较劲史”

■ 本报记者 张凡



1 都是鸡肉惹的祸

二战后，西欧受益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获得了美国资金和技术援助，经济快速复苏。到上世纪60年代初，西欧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上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国由此心生疑虑。

欧共体的崛起加剧了西欧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1962年通过《贸易扩展法》，并使用其中的252条款，对西欧进行报复。252条款规定的报复对象不只限于争议领域，而是覆盖了对手国出口的所有产品。这就是美国贸易法“301条款”的前身。该法第252条规定：“如某一外国实施不公正或不合理的进口限制，给美国的贸易造成负担或歧视的，（美国）总统有权撤回对该国的减让，或对该国的产品增加关税或实施其他进口限制。”

令人难以置信的，催生并使用了252条款的导火索竟是欧美之间的鸡肉贸易大战。

二战后，欧美各国都需要大量的粮食与肉类供应。此时，美国的农业生产开始进入流水线生产的时代，产量的高速增长带来价格的大幅度下滑，美国农场主不得不开始寻觅海外市场。与美国流水线上生产的肉鸡相比，西欧农场主传统散养肉鸡毫无竞争力可言。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鸡肉就占到整个欧洲鸡肉进口市场的一半。由此，西欧各国政府纷纷对此表示不满。荷兰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美国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荷兰

低价倾销鸡肉。法国则直接禁止了美国鸡肉在市场的销售。欧共体也颁布了针对进口鸡肉的高额关税与价格控制法案。

欧共体采取措施之后，北美鸡肉出口量迅速萎缩，到1962年8月，在西欧的销量下降了四分之一，美国养鸡业的损失达到了2800万美元。由此，美国委屈了，认为受欺负了，便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告状。由于GATT调查的时间过长，美国感到十分失望。美国国会便谋求在本国贸易法中寻求一个有效的自救方法。1963年12月，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颁布一项行政命令，决定以远高于美国关税平均2.5%的税率向自欧共体进口的马铃薯淀粉、糊精、白兰地以及轻型卡车征收25%的高额关税。约翰逊还宣布这一措施仅仅是在GATT关贸总协定允许情况下美国政府行使的正当权益。

美国的这一措施无疑是将西欧工农业产品排除在庞大的美国市场之外。随后，美国国会通过在《1962年贸易扩展法》时，授权美国总统面对他国不公平贸易待遇时以进行反击。美国总统肯尼迪随即宣布从1964年起，对从欧共体国家进口的马铃薯、卡车等商品收重税。美国开始向欧共体挥起了“大棒”。

这使得欧共体国家感到了切肤之痛，并开始求和，1964年5月，美国与欧共体国家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和

解大会，美国以降低37%平均关税的代价换取欧洲降35%平均关税。从和解大会的最终结果来看，美国仿佛做出巨大让步，但欧共体受的是“内伤”。在当时背景下，欧洲还处在工业、农业的恢复阶段，跟美国强大而高效的工业、农业体系是没法比的。欧共体国家降低关税，等于让美国商品长驱直入，美国成熟、高效率的生产体系生产的商品在价格、质量方面完全击败了欧共体国家生产商，这让欧共体很久都没有恢复元气。

美国用252条款打击了崛起中的欧共体后发现，这不仅稳固了美国在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地位，并且为美国出口产品消除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此后，美国将之前用来对付欧共体的手段不断完善、不断体系化，使其更具威力，并写进了《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即著名的“核武器”——“301条款”。

此后，“301条款”为美国开拓海外市场 and 捞取贸易好处方面可谓战功卓著。在美欧“香蕉战”、“牛肉战”和“钢铁战”，以及日美“汽车战”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等举世瞩目的贸易争端中，使用“301条款”的效果非常明显。大国也许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而小国一般都会选择破财免灾。在2000年时，WTO一项裁决驳回欧盟要求美国取消“301条款”的上诉，这更为这个单边主义的条款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2 贸易战“核武器”投向日本

“301条款”后来成了美国频繁挥舞的“大棒”，特别是针对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经济体更加有用，欧共体如此，日本亦如此。

当美国还在用“301条款”前身“252条款”敲打欧共体的时候，处在亚洲的日本正在“闷声发大财”。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的GDP已仅次于美国。当美国回过头来时，日本已然变成“眼中钉”。于是，美国开始在经济上打击日本。

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日美纺织品争端还是钢铁争端，美国对其打击作用不是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外部环境起到了很大作用：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让严重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重工业遭受了致命打击，经济衰退和通胀让日本经济停滞。

然而，美国没想到，日本在受打击后又借助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市场成了日本制造的“销售天堂”。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的商品贸易逆差升至500亿美元。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工业中心承担了和日本的主要竞争压力，形成了“锈带”；失业率是美国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尤其是在1985年前后，美国劳动力市场陷入停滞，当时美国经济学界认为汇率问题是美日贸易失衡的主因。1985年，美国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丹佛决议案”。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在国会集结并发起了加收25%关税的贸易战法案。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曾经为了遏制日本的崛起，与日本签订过著名的《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然而，《广场协议》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美日贸易摩擦仍在加剧。一方面，美国的高技术制造业面对与日本的竞争压力，自然地转向了高利润且数量大的国防采购合同，因此1987年美国军费支出增长放缓

后，美日贸易竞争骤然加剧。1987年美国贸易逆差已高达1596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28%。另一方面，美日高技术制造业分工引发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强势美元使得许多国防产品的部件生产被转包给日本企业，日本高技术制造业出现军事化倾向，最终引发了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问题担忧。

引发“定时炸弹”的是1987年著名的“东芝—哥尼斯堡事件”，即东芝非法向苏联销售高技术国防产品。这触碰到了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敏感神经。众所周知，美国为日本承担了大部分国家安全支出，而这一事件的发生则促使美日贸易战升级。随后，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包含“超级301条款”的1988综合贸易法案。于是，美国毫不客气地拿起“301条款”的大棒直接向日本砸去，针对日本的卫星、超级计算机和木材制品启用“超级301条款”，并进行调查。

1994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再一次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恢复“超级301条款”，对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征收惩罚性关税。与1991年启用“301条款”不同的是，这次针对日本的贸易制裁措施一直延长至1997年。这次主要针对的领域是汽车行业，目的是要求日本更加全面地开放汽车市场。在经过调查后，美国裁定采取报复性措施——对丰田等五家企业出口美国的轿车征收100%惩罚性关税，涉案总值达59亿美元。日本为了减少损失，与美国达成解决汽车贸易问题的框架协议后，美国停止执行报复性措施。

日本在出口被封堵的情况下，又实行了比较失败的国内政策，导致国内地产和股市泡沫化，最终使自身经济一蹶不振。因此，有人认为，美国当年对日本发起的“301条款”调查及最终结果是日本30年经济停滞的外部原因之一。此后，“301条款”被称为贸易战“核武器”。

贸易摩擦势必降低美偿债能力

新兴国际评级机构大公研究院近日发布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制造贸易摩擦将导致自身财富创造能力受损，致使其以真实财富为支撑的偿债来源与高企债务负担之间本就严重失衡的状况更趋严峻，国家偿债能力持续降低。该分析称：

一、贸易摩擦不利于美国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出，并会导致其对外贸市场的萎缩，甚至加速美元加息节奏，引发美元阶段性走强，阻碍其出口，美国财富创造能力降低。

首先，贸易摩擦破坏美国自身生产活动。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能够阻碍中国的产品向美国出口，但国际化分工、生产分割已成为产品生产的新趋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仍处于低端环节，产品的大部分附加值仍由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创造，因此贸易壁垒更多的是损害美国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分销商的利益，阻碍了美国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出。

其次，贸易摩擦将导致美国对外贸市场萎缩。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摩擦势必影响双方经贸往来。同时，中国积极同其他金砖国家开展合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建立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贸易市场将向上述国家敞开。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扩大，势必影响美国对华出口和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此外，随着美国退出TPP协定以及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美国的出口市场也会相应萎缩，故中美贸易摩擦将进一步使美国对外贸市场陷入“四面楚歌”“雪上加霜”的状态。

再次，贸易摩擦可能与货币政策产生共振从而抑制其出口。由于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即使美国限制来自中国的进口，美国的企业也未必有动机生产这些商品，除非美国政府在税负和补贴方面给予扶持。如果限制了来自中国低价商品的进口，美国的消费物价或进一步抬升，增强通胀水平的上升趋势，从而加速美联储的加息节奏，美元指数阶段性走强，美国出口再次受到不利影响。

二、美国以真实财富为支撑的偿债来源与高企债务负担间的严重失衡状态无根本性改变，贸易摩擦引发的财富创造能力下降将使其偿债来源基础进一步恶化，美国偿债能力将持续下降。

首先，美国以真实财富为支撑的偿债来源与高企债务负担间的严重失衡状态极为脆弱。近30年来，美国逐步形成以国民超前消费、政府财政赤字和对外贸易赤字为特征的债务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常年入不敷出压力使美国陷入饮鸩止渴般“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并凭借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将债务风险转嫁给国际债权人，其国家偿债能力较弱的本质未发生改变。

其次，贸易摩擦引发的财富创造能力下降进一步恶化了其偿债来源基础，使以财富创造能力为债务偿付基石的信用关系更趋严峻，美国的国家偿债能力将持续下降。一方面，过高的债务负担将阻碍经济发展，而2016年美国的国家总债务占其GDP的比重已高达252.8%，联邦政府债务负担也在高位继续攀升，美国债务滚动空间已严重不足，依靠债务驱动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另一方面，贸易摩擦带来的财富创造能力下降进一步削弱了债务滚动的基础，依赖债务滚动偿还债务的方式亦愈发难以维系，国家偿债能力势必持续降低。（张璜）

应对“301调查” 中国要有自己的“金刚钻儿”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近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表达中方立场时指出，中国会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如何捍卫中国合法权益？中美贸易何去何从？《中国贸易报》记者为此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和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

中企应未雨绸缪

周世俭认为，贸易逆差是美国发起审查的核心原因。他表示，特朗普授权审查“中国贸易行为”名为公平，实际上是对贸易逆差耿耿于怀，借口公平贸易实施贸易保护，并掺杂着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朝鲜问题等多种诉求，借此向中国施压。

白明也认为，中国随着产业和外贸的转型升级，日益向中高端阶段攀升，美国却在推动中低端制造业回归，于是形成了重合地带，产生“抢饭碗”的贸易争端局面。美国为了保护本土工业，启动了所谓的贸易制裁。

白明表示，此次美国具体的指控是“中国涉嫌违反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因此，在美的中国科技型企业及和美国科技类公司有较多往来的中企也可能受到直接的影响，甚至是调查。

“除了机电和高科技产品，美国还会针对中国其它领域产品进行贸易调查或政策保护，以增加博

弈筹码。”白明说。

白明认为，目前，多个企业都在实施国际化战略，对“301调查”要积极应对，一方面努力开发新产品，争取在全球范围内扩大销量并提高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寻求国际领域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要多措施应对

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大型美国企业极力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也将通过收紧规章制度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能力，以防止美国的资产被买走，并限制技术转让。

白明认为，这是美国转移了问题的核心。“市场换技术”一说本身是个伪命题，高技术企业进入中国，如果缺少当地合作伙伴，便很难开展业务，这是双方企业“你情我愿”的事情。

“美国扩大敏感领域范围也没有必要。民营企业确实可以接受国防订单，但过分夸大技术的军事作用，对贸易是很大的掣肘。”白明说，在接下来的调查过程中，双方首先应互相沟通、相互理解、争取信任，美国要学会理解并适应中国的崛起与和平发展之路。

周世俭认为，“301调查”违背世贸组织规则，中美都是WTO成员，若双方最终未能争取和解，中国可借WTO机制在日内瓦与美国对簿公堂，保护自身利益。

“301条款”赋予了美国贸易代表单边发起调查的所谓权力，以及赋予美国政府无须WTO同意，即可对被调查国采取施加关税、贸易制裁等单边措施的所谓权力。美国在处理双边问题上惯用国内法，并认定国内法高于国际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世俭表示，美国国内法对其他国家来说并不适用，对中国也不适用，中国只能服从WTO规则。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也认为，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已经为实施合理合法的贸易救济措施提供了充分空间，也建立了有效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应该基于理性的态度采取建设性措施，按照中美两国会晤方向，扩大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而不是减少中国向美国的出口。

周世俭援引数据称，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商品进口市场，美国出口中22%的棉花、56%的大豆、26%的波音飞机的目的地都是中国，美国进口中60%的鞋、37%的纺织品服装、94%的平板电脑来自中国，“一旦发生贸易战，中国可以在这些领域采取措施。”

俄罗斯媒体则为中国指出了另一种可能的方向。俄媒称，中国可以加倍努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回击美国调查。这将确保中国的长期目标：人民币国际化，保

护中国的生产、销售和供应链，以及确保国内经济增长。

虽然短时期内，沿线国家市场还无法完全取代美国市场，但白明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未来中国全球化耕耘意义深远，应坚定实施。

坚定自主发展之路

“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预期成本是不一样的。这点要看清楚。”白明表示，尽管中美贸易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式存在，但也有相互之间依存度的问题，这种依存关系是否可被替代，对于谁能够获得主动权尤为重要。

“中美贸易博弈的筹码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服装、玩具产业领域，美国本土虽不能生产，依赖进

口，但可以找到墨西哥等替代市场，而中国产品却很难找到像美国这样的高消费替代市场。”白明说。

白明认为，面对美国打压，中国应继续坚持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增加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打造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以此增加贸易摩擦中的博弈筹码。

周世俭表示，除了要争取主动，按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贸易法行事，双方企业还要积极磋商。

白明称，除了利用国际规则外，中国应当让支持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落地并产生实效。同时，要努力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总部”，在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全球化布局。

“总之，应对‘301调查’，中国要有自己的‘金刚钻儿’。”白明说。

